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

近代中国 政治文明的构建

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
政治改革思想研究

栽藥悅壯神助靈藥出果有孕藥止孕藥養胎治諸虛百損土
韵灶運早再果曾藥栽果早果煉引運藥草匯藥電 蛭順藥
靈感惡碩藥藥電 配藥藥草漢賊

龚郭清瑶著

员燥旱员燥燥旱旱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序摇一

耿云志

康有为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主要领袖，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改革家、思想家。一切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都无法越过他。因此他的大名几乎是人人皆知，对于他的研究，也早已不是新鲜的课题。但是要我们提出几本真正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康有为的思想体系的书，实在举不出几本来。萧公权的《康有为思想研究》是第一本这样的书。其价值是学界所公认的。此书初版于 1949 多年前，直到 1985 年始出中文版，流传到内地，不过十几年的工夫。至今，我们还没有看到第二本类似的书。自然，有不少研究康有为思想的专题性的书和论文，其中不乏有创见的论著。然而我们还是期待有深入系统研究康有为的思想体系的著作出来。现在，龚郭清的《近代中国政治文明的构建——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政治改革思想研究》一书，正可谓应运而生。此书虽是针对戊戌维新运动时期而言，但谁都知道，康有为的思想在此时期已完全成熟，其思想体系已经构建起来。所以此书的内容，它的研究方法，它所重现的康有为的思想体系，是可以映照康有为一生的思想的。这是一本值得学术界重视的书，凡是研究近代思想史，研究戊戌维新运动，尤其是研

究康有为的学者，都应该看看这本书。

深入研究思想家的思想，把他们思想的本来意蕴彻底弄清楚，把他们的思想体系按其本来的理路重新建构起来，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对那些经历丰富，著述甚多，思想复杂，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尤其如此。康有为自然当得上是这样的一位思想家。

我觉得，思想家大体有两类。一类是因随时应对世变而发为思想主张，总其一生著述，亦颇成体系。如孙中山等是。我称这一类思想家是开放式的思想家。另一类是总结前人思想，融会所学，自铸体系，即以此体系去解释和应对一切世变。如黑格尔等是。我称这一类思想家是封闭式的思想家。康有为亦属此类。对于前一类思想家的思想，相对来说，似较易把握。对于后一类思想家的思想，要真正弄清其意蕴和内在理路，似比较地不容易。他们的思想具有强烈的主观性，与现实的联系往往不那么直接；而单就思想论思想，便极易发生歧义。黑格尔死后，批评黑格尔的人，大多只是站在黑格尔体系的外面加以褒贬。恩格斯说他们只看见修建大厦的脚手架，而没有看见大厦本身。以往，特别是 19 世纪 90 年代以前，对康有为的批评即往往失之于此。所以，我觉得对于像康有为这样的思想家的研究，必须先下工夫，深入到其思想体系的内部，充分了解其内容、结构、思想意蕴及其理路。做了这一步工夫之后，再考察其上下左右其他思想家及时代演进的实际情况，方可对康的思想做出比较切于实际的批评。

龚郭清的这本书，可以说是真正下了大工夫，钻入康有为思想体系的内部，做一番研究。他对康有为的思想体系，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颇觉得比前人的研究更具涵盖性。前人绝大多数都只注意其政治改革的内容，较少顾及其他。此书除制度

构建之外，用了很大篇幅从价值追求和社会构想方面对康有为的改革思想做出更广泛、更深层的分析论述。如指出康有为戊戌维新运动的价值追求既有外在的方面——适应时变，亦有其内在的方面——“人性圆满”（“人性圆满”似不是康有为本人的提法。我觉得最好再加斟酌，换一个较为更妥当的提法。近代史上，人们的内在追求，根本上就是“人的解放”，人自身价值的实现）。又如，从前对康有为关于组织学会、创办报刊、兴办学堂等等的思想主张和实践，多半只从思想解放或思想启蒙的意义上加以评述。而此书则从“社会构建”的角度加以分析论述，亦比较更具涵盖性，亦更为深刻一些。至于康有为的孔教思想和主张，前此绝大多数学者，包括我本人在内，都从孔子学说本质上的非宗教性，康氏对孔子思想的某些曲解，及康氏创教的不切实际性等方面给出否定的评价。应当说，这种评价是有道理的，也是符合实际的。但从康氏对社会构想的角度去观察，则康氏的想法并非全属荒谬。康氏似注意到西方国家基督教曾在某种程度上起到牵制君主专制权力的作用，因而想利用孔子学说在中国社会源远流长和深入人心的影响，使之体制化为一种宗教，以便在发挥其教化人心的作用的同时，也发挥某种程度的牵制君权的作用。康氏这一主张不具现实性固是事实，但也未可完全抹杀其“主观的合理性”。本书作者对其“主观的合理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一点，不无意义。

研究历史的人，对于创造历史的人，既要有“同情的理解”，也要有“评判的态度”。前者可令我们尽量理解前人思想主张的本意及其行为的出发点，以避免作诛心之论或过分苛求前人。后者则要求我们立于后来人的立场，从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智慧的态度出发，给前人一个尽可能符合实际的历史定位。

我觉得，此书作者对于康有为在“同情的理解”方面做得很好；于“评判的态度”方面，还有继续努力的余地。

梁启超说他的老师，~~猿~~4岁学问已成，此后不再变化。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他属于封闭式的思想家。长期以来，人们都讥其落伍（有的人则直斥其反动），不能“与时俱进”。

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说，这种封闭式的思想家，亦有其好处。它有凝固性，故于思想史上成为一种坚挺的存在，成了一个界碑。康有为是中国思想史中，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的最后一个大儒。海内外有人把梁漱溟或其他继续张扬儒学的人称为最后的儒家，是不很妥当的。梁漱溟或其他张扬儒家学说的人，以及号为新儒家的学者，他们思想的内容，表述的方法，已远不是儒家的本来面目了。康有为与他们大不相同。康氏所使用的基本概念，思考的基本内容，表达的方法，仍然基本上都是儒家的。康氏强烈地以孔子真传自待，以重建儒学体系，确立孔子学说为拯救人类的唯一真理的地位自命。就我们研究者的立场上说，康有为是最后一位想拯救孔子与儒家学说的至尊一统地位的思想家。

如果我的上述见解不为大谬，则康有为研究就具有更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思想史的意义。我想，对康有为的研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我希望眼前这本书的出版，能引起广泛的讨论，使对康有为的研究继续取得进步。

國曆元年 源月 景日于北京太阳宫寓所

序 二

崔之清

—

龚国庆（笔名龚郭清）教授的新作《近代中国政治文明的构建——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政治改革思想研究》已经三易其稿，准备正式出版。春节前，国庆发来电子邮件，将书稿附录发送，并嘱我为新作撰写序言，令人倍感欣慰，因此欣然受命。春节期间，除了必要的贺岁应酬，就埋首拜读这部大作。从除夕到正月初七，终于读完这部约 40 万言的书稿。

拜读之间，深感国庆学力之长进，研究之专精、学术之创新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 1995 年 12 月博士论文答辩后离开南京大学返回浙江师大执教的 10 年期间，国庆在繁忙的教学之余，集中精力探讨和研究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的政治改革思想，发表了多篇颇具学术新见的系列论文，最后推出这部总结性的学术专著，令人十分感佩和兴奋。拜读之余，不禁回忆起国庆勤奋治学及我们亲密相处的岁月情境。

国庆籍隶浙江义乌，1955 年 12 月生。据国庆自述：“1955 年 12 月

年出生的我，父母从未有幸迈进学校大门，家无藏书，中小学又正赶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似乎是在文化沙漠里长大的。”^①就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夕，~~1976~~1976年 苑月，国庆毕业于义乌中学，同年 5 月下乡插队。因此，他是最后一批务农的城镇知识青年。但是，国庆聪慧好学，插队务农时不忘学业，不仅认真劳动，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使之具有丰富的社会体验，而且喜读课外的书籍，知识面也有所拓展。~~1977~~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高考制度，国庆立即报名应考。~~1978~~1978年 猿月开始，就读于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历史系本科（~~苑级~~苑级）。杭州大学历史系是浙江史学研究中心，也是全国学术重镇。国庆深受杭大优良学风的教育和熏陶，而且他格外珍惜和抓紧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奋力拼搏和钻研，掌握了扎实系统的历史知识和治史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为日后从事史学教育与研究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庆回忆说：

文化饥饿感，使我在“大革文化命”岁月里，尽力寻找各种书籍填充辘辘饥肠，而不至于患现时儿童常有的厌食症或消化不良症；正是这种文化饥饿感，使我感到知识文化殿堂的“高尚”、“神圣”，并使这种圣洁感超越岁月烟波、世态炎凉而保留至今；正是这种文化饥饿感，使我这位下乡插队一年又半的知识青年，抓住机会成为 ~~70~~70年代末高考制度恢复后的首届大学生……^②

① 龚郭清：《追求民族富强和人性圆满——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政治思想透视》，“后记”，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1994

② 龚郭清：《追求民族富强和人性圆满——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政治思想透视》，“后记”。

不难想象，“正是这种文化饥饿感”，使国庆获取了强劲不竭的学习动力与活力，也是他不断进取、勇于攀登史学高峰的力量源泉。

本科毕业后，国庆分配至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他认真教学，注重继续学习与深造，~~1985~~年~~10~~月至~~1986~~年~~12~~月，赴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担任访问学者，一面汲取新的知识营养，一面努力从事史学研究，着重培植独立研究能力。而且，国庆初步确立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他对中国近代思想史颇有兴趣，并为此投注了大量的时间和心力，积累了比较系统的知识和资料，具备了从事学术研究的实力与基础。

但是，近代思想史领域极为广博，作为初次涉猎的青年学者，必须谨慎选择适合自己能力和学界关注的议题，作为切入这一领域的学术平台，才能循序渐进，不断深入近代思想史的殿堂。国庆经过审慎的思考和选择，决定把梁启超思想研究作为首选的学术议题。梁启超思想宏富精彩，因时变易，堪称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传奇式人物。如果能在梁启超思想研究领域有所创新和建树，就是对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突破。于是，国庆开始进入这一学术领域，对梁启超思想展开专题性的系列研究，共发表了~~15~~余篇学术论文，涉及梁氏思想的各个主要层面，如史学、教育、政治、社会文化等思想内涵与特征的分析论述，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系列论文。记得，~~1985~~年~~10~~月，国庆报考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生时，初试成绩优秀，再由我主持复试。从报考登记表上，我就看到国庆在梁启超思想研究领域的系列成果，拜读了他的代表作，深感其史学功底扎实，研究议题相当专攻，独立研究能力突出。复试组的其他成员皆有同感。因此，虽然国庆缺少硕士研究生的经历，我们一致同意他攻读博士学位。~~10~~月入学，我有幸担任国庆的指导教

师，遂有了师生情缘，更是亦师亦友的情谊。

国庆攻读博士的猿年期间，我得以近距离见证这位年轻学者刻苦、勤奋、善于思考与创新的治学精神及实践。虽然身为大学教师，国庆仍然不改书生本色，认真修完了全部学位课程，成绩优秀。而且，他继续从事梁启超思想研究，注重在文献资料 and 理论、方法上投注心力，发表了多篇论文。同时，承担原单位的教学工作，将研究心得反哺教学，表现相当突出。因此，读博期间，国庆被晋升为副教授。他认真扮演了学生和教师的双重角色，正确处理了角色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形成互补双赢的共生关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受到指导小组的肯定，~~1988~~1988年获评南京大学第九届光华奖学金一等奖。

二

撰写学位论文是读博期间的关键环节，也是我们高度关注的学术主题。论文选题的基本方向早经确定为梁启超思想研究。但是，梁氏一生经历复杂，思想几经流变，著述宏富，面广量大，全面系统地考察和研究难度极大，容易流于泛泛而论，不易达成学术创新的撰写目标。因此，经过我们师生反复研商和论证，选取梁启超思想最活跃最富创意的戊戌维新时期，而且集中考察和研究他的政治思想。这样，可以展开系统深入的专题研究，便于集中时间和精力，充分搜集和掌握选题的有关文献资料，全面系统地梳理选题的学术史，了解和把握前沿研究动态，就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前进，有所创新，写出高质量的博士论文。但是，戊戌时期的梁启超一向是学界的研究热点，成果相当丰硕，要想有所创新殊非易事。我们深入思考和求证，觉得传统的陈述史学难以取得学术创新，必须在理论方法

上有所突破，构建具有创意的新型的分析 and 解释体系，才有可能超越前人的研究成果，对戊戌时期梁启超政治思想做出创新性的分析和解读。为此，国庆注重从三个方面取得突破。他说：

第一，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导向，运用多种现代社会学科（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的理论和方法，对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政治思想作一系统全面探讨，在国内有关研究视野和体例中具有开拓意义。第二，努力克服传统史学观念和方法的局限，立足于内涵“自由”价值尺度的“现代化史观”，贯彻“整体论”的研究方法，使有关研究成果具有相当的逻辑完整性和历史适应性，更接近丰富多彩、复杂多变的历史辩证运动过程。第三，在认真阅读原始文本的基础上，从民族竞争与人性需要双向度来探讨梁氏政治思想主体建构……^①

结果，国庆经过近两年的钻研和撰稿，~~1998~~1999年春，完成了近十万言的学位论文《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政治思想研究》，把他的学术构想转化为研究实践及成果。记得，在完成这部大作之后，国庆曾深有感慨地说：“这是我治学历程中一次最艰难、但却是最有意义的学术实践，使我经历了一次从清理学术史、拟订选题、搜集和消化史料、理论方法选择、论述思路和框架设计到撰稿阶段的、严格的、全过程的研究训练，为未来的学术生涯提供了值得遵循和继续探索的治史范式。也许这是我博士生阶段最大的体验和收获。”对此我也颇有体认。显然，这次

① 龚郭清：《追求民族富强和人性圆满——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政治思想透视》，“导言”。

撰写博士论文的实践意义，不仅在于写成了具有学术创新价值的精品力作，更在于学会和掌握在新史学的语境中治史的理论与方法。因此，国庆收获的不只是著作，更重要的是从实践中总结和提升的经验。他具有勤敏的悟性，透过这次艰苦的实践，完成了一次从感性到理性的转化过程，开启了治学的新阶段。

功夫不负有心人。国庆的学位论文得到所有评阅人、评议人和答辩委员的一致好评，都给予“优秀”的评价。当然，老师们也提出若干修改建议。国庆认真听取了这些深刻和宝贵的意见，“答辩后，经过一年左右的反思和充实”^①，博士论文修改定稿，以《追求民族富强和人性圆满——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政治思想透视》之名，于1984年猿月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面世，为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艰辛劳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三

1984年远月，国庆在南京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回到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执教。行前，我们做了一次深谈，关于国庆未来学术研究规划是讨论的重点。当时，我们的基本共识有两点：①修改和充实博士论文，及早出版；②根据撰写博士论文的成功经验，研究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的政治思想。其实，在博士论文中，国庆在“下篇”就专列了一节“试论戊戌变法时期康梁之异同”，对这两位戊戌变法的领军人物展开了初步的比较研究。他认为，“戊戌变法时期康梁政治思想具有基本的相同性……康有为对梁启超的思想影响，在戊戌变法时期，主要表

① 龚郭清：《追求民族富强和人性圆满——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政治思想透视》，“后记”。

现在‘以群为本，以变为用’的学说”。“然而，即使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梁思想也已表现出相当的差异”。并且，举出若干重要史实分析和论证了他们之间的主要思想和行为差异。^①可见，国庆已经开始关注康有为在戊戌时期的思想和行为，尤其是康氏与梁启超在这一时段思想的比较考察。回到浙江师大以后，他便把原来规划的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政治思想研究作为近期的治学目标。

据我的观察，在读研期间，国庆对康有为的基本研究状况、主要文献资料已经有了初步的掌握和积累，而且产生了大体上的评价。这从上述康梁思想的比较分析中可以得到印证。于是，1982年缘月，在完成了博士论文的修订后，国庆立即进入康有为研究。

根据梁启超研究的经验，国庆决定从新的理论视角考察和研究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的政治思想，撰写戊戌人物思想研究的姐妹篇。国庆之选题，以《价值、制度、社会——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政治改革思想研究》之名，在省外专家匿名评审的基础上，被列为浙江省1983年度哲学社会科学常规课题重点课题。其间，发表了多篇阶段性研究的学术论文，并于1984年晋升了教授。1984年圆月圆日，完成了全书初稿。猿月员日，做了第一次修改，拿出了二稿。接着，为了进一步充实资料，集中时间和精力修改新著，国庆在1985年猿~苑月专程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访学。其中前两个月抓紧修改，于缘月员日推出了第三稿，并拟定了书名《近代中国政治文明的构建——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政治改革思想研究》。这就是我拜读的文稿。

回顾国庆新著的撰稿过程，他曾与我通过几次电话，又先后两次亲赴南京面谈。因此，我基本知晓新著的立论依据、基

① 参见龚郭清《追求民族富强和人性圆满——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政治思想透视》，第144-145页。

本论述思路和大体结构框架以及进展情况。经过远年的刻苦努力，终于推出新著，达到了预期的治学目标，我深表祝福和感佩。今年春节长假，研读新著之后，初步厘清了序言的撰述思路，而且在节后开始动笔，写了一、二两个部分，回顾了国庆求学治学的艰难历程，尤其是我们之间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以及撰写博士论文的互动场景，几乎历历在目。可是，新学期伊始，忙于工作及颇多的社会事务，无法抽出整段的时间继续撰稿，序言遂暂告中断。其间，国庆曾于猿月源日赴宁晤面，谈及了序言的大体思路与内容。一直延至“五一”长假，才得以继续并完成撰稿，向国庆交卷。

四

长假期间，重读了国庆的新著，感受更加深刻。归纳起来，新著有四个明显的特色。

选题立意高远，注重整体性的学术创新

戊戌时期康有为政治思想研究是一个传统的选题，学界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而且不乏海内外的名流方家，已经构筑了高水平的学术平台。后人要想取得突破，做出有新意的文章，委实存在诸多困难。国庆却勇敢选择了这一挑战性的难题，从高起点上重新审视和认识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认真回顾和检讨了康有为思想研究的学术史，在肯定前人研究成就的基础上，分析和归纳了存在的问题。他说：

从总体上看，海内外史学界的有关研究也存在着某些明显不足：对康氏政治改革的基本价值追求，比较关注康

氏早期政治改革思想的具体时代意义或近代民族救亡图存的价值追求，而相对忽略其人生普遍意义或人性圆满的普遍价值追求；对康氏关于君主立宪“政体”的构思及实践，较少系统的政治学建构，并缺乏在与社会政治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作动态的社会生态学观察和理解；对康氏从事政治改革运动的方式，过分强调其“自上而下”的方式，而较为忽视其在民间的实践，未能充分说明其“自下而上”的运动方式及其对维新变法运动的基本意义。

看来，国庆根据研究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路径，对康有为政治思想的研究现状提出了三点质疑。第一，学界较多地关注康有为变法思想动机中强烈的救亡图存意识，忽视了康氏追求人性圆满的理想。第二，对康有为政治思想的分析和解释缺乏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第三，学界侧重于考察和研究康有为依靠朝廷及官方，采取自上而下的变法方式，却忽视了旨在动员知识精英群体的自下而上的组织和文宣活动。因此，国庆在选题立意时具有相当明确的研究目标：“使有关研究结论能够立足于 20 世纪社会政治生活及其问题意识，立足于融合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及生态主义的某种基本理论立场。”这样，对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政治思想研究就能够站在新的学术制高点上，并力图从上述三个方面实现整体性的学术创新和突破。

为此，国庆对新著提出了整体的学术构想：

本书试图在仔细阅读有关史料的基础上，立足于内涵“自由”价值尺度的“现代化史观”基本理论立场之上，从整体性的“政治文明”角度来透视维新时期康有为政治改革思想，分别说明康有为政治改革思想的各个基本方

面——价值理想、政体构建和社会基础，同时尽量阐发康氏政治改革思想的时代意义、传统根基、实践智慧及深远的历史影响。

应当说，国庆治学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能够发现和揭示既有的关于康有为变法思想研究的主要缺失，而且能够针对缺失提出新的研究目标和整体性创新性的学术构想，从史料考订、理论和方法运用、康有为政治思想的各基本层面的分析与透视，到康氏思想的源流考论及其历史地位，都列入学术创新的范畴。因此，从选题立意而论，可谓高屋建瓴，心存高远，但又落到实处，体现在新著论述的各个方面，不致陷入空论和浮躁的弊病。

文献资料丰富，实证基础厚实

充分占有第一手文献资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工程，更是史学家的基本功课。国庆长期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对戊戌变法时期的思想史尤有专攻。经过近 30 年的搜集和积累，已经掌握了康有为、梁启超等戊戌群体的第一手文献资料。仅列入参考和利用的就多达 300 余种，大部分是初版的史料，此外，还列出了当时散布多个城市的报刊资料。据说，为进一步了解和理解戊戌维新运动的社会文化背景，国庆曾花了近半年时间逐一浏览、摘录 1898 年—1900 年的《申报》资料。同时，国庆还注重阅读前人和时人的研究著述，涉及海峡两岸、港澳及外国学者的主要成果。仅书后附录列出的论著就有百余种。因此，在探讨和论证有关康有为思想的主要问题时，国庆都能引用和评述既有的有影响的学术观点，并结合原始资料展开比较和考证，从而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解。而且，还有大量具体的事证被国庆放在注释里加以注明。这部著作具有长期积累的扎实的史料功底，

从而为准确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厚实的资料基础。

实证研究是历史学的基本方法，也是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基础。康有为在戊戌时期活动频繁，人际关系复杂，著述丰富，思想变化节奏较快，必须根据原始资料，尽量予以考证和厘清。因此，实证是厘清史实的根本途径。国庆深知实证在治史方法论中的基础地位，因而在各个章节，针对不同的问题，都首先通过实证重建历史场景，之后再进入运用多学科理论和方法进行学理分析和解释的阶段。否则，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就会缺乏真实的历史依据，成为沙滩上的华丽楼阁。国庆在列举学界同仁的有关立论时，一般都会举出论者的史实依据，显得客观和公允。在分析讨论同行的观点时，首先从厘清史实开始，当然，实证成为讨论问题的首选方法。这种透过实证立论或讨论问题的撰述范式在这部著作中俯拾皆是。因此，大量的严谨求真的实证研究是这部著作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也是国庆治学的重要特色。

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导向，在实证的基础上，展开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康有为的政治思想研究属于思想史的学术范畴，但却涉及多个学科领域。首先是历史学，历史文献分析、实证研究、环境背景及近代思想史的论述，都必须秉持历史学理论与方法。因此，历史研究是本书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主体，也为其他学科理论、方法的运用提供了可信的史实依据。此外，涉及的学科有政治学、社会学、哲学、伦理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等。而且，康有为是一位思辨型的政治改革家和思想家，经过严格的儒学教育，对今文经学的学术造诣深厚，并有独特的学术见解。康有为全力拉抬今文经学的地位，并将其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同时，他又关注西学和列强的国情及历史，也

将其合理部分吸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因此，国庆必须对戊戌时期的西学以及经学有相当的体认，而且要熟稔鸦片战争以后的思想史，这也需要相关学科知识的支撑。可见，研究康有为的思想必须有深厚的多方面的知识积累，其中包括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学识。国庆经过十余年的专业学习和研究实践，尤其经历了运用多学科理论和方法对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政治思想的研究过程，因而具有成功的研究经验。如今运用在康有为思想研究上，更加成熟和自如。

检视全书主要章节，以实证提供的史实为依据，再运用相关学科理论、方法进行学理分析和解释，从而得出新的学术见解，可以举出颇多例证。例如，对康有为变法动机的分析，作者归结为“适应时变”和“追求人性圆满”两个基本因素。作者的结论是：

康有为认为，压制性的传统君主专制制度违背了“好生”的“天地之大德”，违背了作为社会性生物的人类本性，应予以废除。未来的制度，应在彻底估摸人性（人情）或民心的基础上创新，应在吸收全人类“仁道”、“仁政”等政治文明成果（“上法三代，旁采泰西”）的基础上重建，以达到“使人人皆得乐其生，遂其欲，给其求”的根本目标。

这一学术见解极具新意，揭示了康有为对人性圆满的追求，并纳入未来制度的构建，可谓发前人所未发。

在“制度篇”中，运用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康有为设计的新型政治体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论证了它的基本依据、基本原则、基本构想和根本宗旨，这也是学界的首例。在“社会篇”中，对学会的解释，则引入社会学的方法，突破了陈述